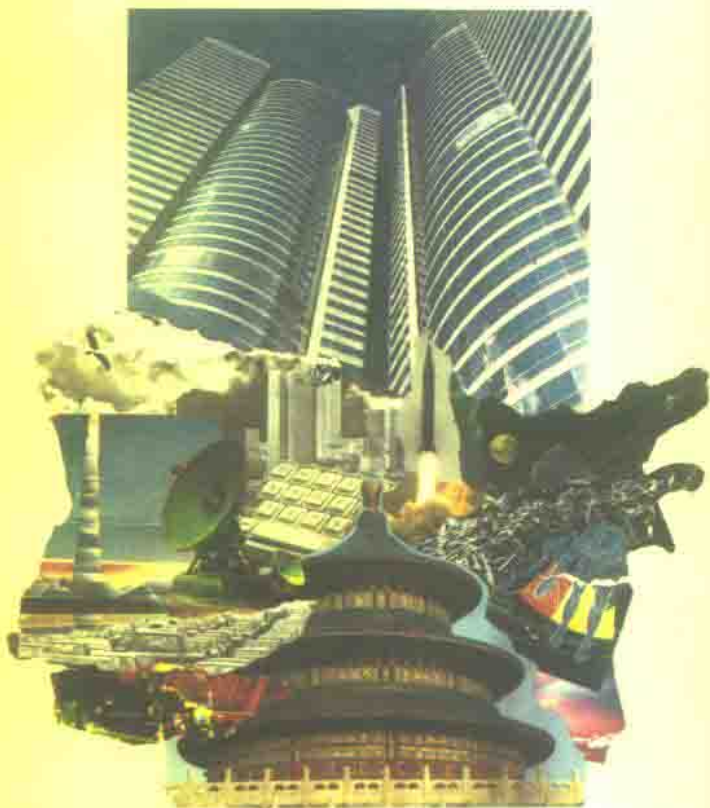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

# 中国现代 化历程 的探索

罗荣渠 牛大勇 编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

#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

罗荣渠 牛大勇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

罗荣渠 仲先勇编

责任编辑 冯英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 415千字

1992年1月第一版 1992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600册

ISBN 7-301-01668-9/K·120

定价：8.85元

## 编者前言

中国的现代化,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当前国际国内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为了研究中国现代化的今天,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现代化的昨天。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科学的考察,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之一。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者能够比较广泛地了解台湾、香港及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主要成果,借鉴不同的研究方法,开阔眼界和思路,我们从近二三十年来台、港及海外出版物中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编成《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一书。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以及国际学术交流,是推动中国现代化问题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工作。

本书收入的各篇论文的作者都是海内外知名学者,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学者,他们的论文也大多是从中文刊物上收集来的。只有少数几篇是出自美、英、日学者,或中国学者用外文写的,选译自外文刊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没有可能包括台湾和海外研究者的全部重要成果;加之所掌握的资料不全,选入的论文也不一定都最具有代表性,但力求能反映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不同侧面。由于海峡两岸政治观点之不同,所选论文,都不代表选编者的观点。

本书编排按内容大致分为五个部分:中国现代化历程总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论文排列顺序是依据内容与研究范围的层次顺序,而不是按照发表的时间先后。

本书所选论文均按原样排印，个别处有删节，并改用简化字横排，使用现代书名号和公元纪年。每篇论文作者有小注简介。

本书选编时间仓促，因联系不便，所选文章未能一一征求原作者意见，谨此致歉。选编如有失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990年12月20日

# 目 录

## 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

——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

现代史的概念架构 ..... 金耀基 1

## 中国近代化的延误

——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 ..... 郭廷以 23

中国现代化初期的助力与阻力 ..... 张朋园 44

中国现代化的动向 ..... 张玉法 69

## 通商口岸与中国现代化:

走错了哪一步? ..... 墨菲(Rhoads Murphey) 98

## 进步的报酬:

### 中国经济现代化初期的

基本问题 ..... 伊懋可(Mark Elvin)116

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 ..... 全汉升 148

中国货币与银行的朝向现代化 ..... 张公权 172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郑竹园 210

为什么中国未能走上日本式道路? .....

..... 怀特(Gordon White)227

## 中国政治现代化运动中的

改革与革命 ..... 高慕轲(Michael Gasster)255

## 甲午战前西方民主政制的传入与

国人的反应 ..... 吕实强 272

## 行政制度现代化

——康有为之主张及其意义 ..... 肖公权 313

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 殷海光 341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化或现代化的关系 ..... 孙广德 374

中国人性格与行为的形成及蜕变 ..... 杨国枢 395

中国的传统城市和现代化 ..... 章生道 413

中日现代化诸因素的比较研究 .....

..... 利维(Marion J. Levy, Jr.) 433

清季同光自强运动与日本明治

维新运动的比较 ..... 李恩涵 454

十九世纪后半叶日中两国的现代化 ..... 依田熹家 479

# 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

——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

现代史的概念架构

金耀基\*

## 一、现代化之含义、类别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今日人类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革命性的形变<sup>①</sup>。这个巨大的革命性的形变,当可以有不同的名词来形容它。但历史学者、社会学者所能给予它的名词之一当是“现代化”。这个现代化运动的特色之一是它是根源于科学与技术的<sup>②</sup>。其特色之二是它是一全球性的历史活动<sup>③</sup>。更明确地说,这个现代化运动是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形变的最近期现象,它是十七世纪牛顿以后导致的科技革命的产物(一般人常

---

\* 金耀基(1935—),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政治大学政研所硕士,美国匹茨堡大学博士,历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教授、新亚书院院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研究,著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国民本思想之史底发展》等。

① See, *The Mea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Great Transition* (N. Y.: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65.) Chap. 1.

See,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 Y.: Harper & Row, Torchbook ed., 1967), pp. 1—5.

② 见 Boulding, op. cit., Chap. 2.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the Great Transition.”

③ 历史学者 E. H. Carr 指出只有在今日,全球人类才第一次进入历史的范畴中,亦即成为历史学者研究之对象。See, *What is History?* (N. Y.: Alfred A. Knopf, 1962.) p. 199.



以工业革命称之)①。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化是发源于西方社会的。西方社会经由数世纪科学之洗礼,古传统、权威、价值皆受挑战,科学成为“了解”世界的基本法门,技术且成为“改变”世界之重要工具,西方之现代化了底社会的特性乃是以科技为主导性的②。科学与技术是具有普遍性的,亦即无时空性的,因此,当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遇合时(此种遇合或经由西方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或经由与西方文化、教育之交换),非西方社会立刻面临到一科技的全面入超现象,而此科技入超乃导致其传统的生产方法、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等之转变、破坏,而日渐朝向“西方型模”趋进,社会学者李维(M. J. Levy, Jr.)称此现代化之特征为“普遍性的社会溶解剂”(universal social solvent)③。亦即西方现代化社会对非西方社会的一种科技性的“同化力”,许多人把这个现象称之为“西化”、“欧化”或“美化”。这个说法可说不错,但亦不对。我说他不错是因为现代西方社会是现代化了的,亦即科技化了的。冷纳(Daniel Lerner)说“现代化”与“西化”的同时出现是一“历史的偶合”。“西方型模”在历史的意义上说是“西方的”,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则是“全球性”的④。我说他不对是因为“西方型模”的基素虽然是现代化的,或科技化的,但“西方型模”却含有非科技性的质素,如宗教、文艺等。因此,“现代化”

---

① 关于科学革命,参见 K. E. Knowles Middleto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Schenkmen Publishing Co., 1963.)

② 参见 Bertrend Russell, *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 (1952)台北, 状元出版社重印, 1965年。

③ M. J. Levy,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et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④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参见拙文《传统社会的消逝》,收入拙著《现代人的梦魇》,商务,人人文库 136—137号,1966年,台北。

不必等于“西化”<sup>①</sup>。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应该进一步探究“现代化”之含义如何？现代化一词之定义极不容易确定，常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的。许多人常把“现代化”、“工业化”、“开发”(development)看做同义词。其实，这三者虽为一相关的现象，但却各有其不同之范畴与内含的。班狄克斯(Reinhard Bendix)以“工业化”为基于技术及实用科学研究所导出的“经济”变迁。“现代化”则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之“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至于“开发”则是指与工业化及现代化二者有关之变迁<sup>②</sup>。李维对于“现代化”的定义与班狄克斯的颇近，他说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成员利用“无生命的能量”(指人类与动物能量以外的能量)与“工具”(指物理的设计)以增多其努力之效果。这里，我们不想对现代化的特性多所讨论<sup>③</sup>。我们不妨记住“现代化”是指传统性社会利用科技之知识以宰制自然，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过程。

现在我们要对现代化的类别加以说明。这里我们可从现代化之内容及其发生的源头来分。自内容说，则可以大致分为心智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和心理的现代化等<sup>④</sup>。自其发生的源头来说，则照一般学者的通论有二：一是自我本土的发展或内发性的(indigenous)现代化；一是

---

① 关于这一点，李约瑟有较合理的说法。他以为欧西人之科技是具有普遍性的，从而他们产生一精神之浮夸，以为只有他们的文明形式是有世界性的。殊不知科技只是欧西文明中的局部质素，以局部误夸为全部，乃是欧西人之文化中心主义。见 Joseph Needham, *Within Four Seas; the Dialogue of East & Wes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9) pp. 11—30.

② R. Bendix, *Nation—Building &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 (N. Y.: Doubleday Anchor Book, 1969) pp. 6—7.

③ 作者对“现代与现代化”之意含已另有讨论，见拙著《从传统到现代》，(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69年)第三章。

④ Black, *op. cit.*, pp. 9—26.

外力促逼而生或外发性(exogenous)的现代化。前一种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本身经长期“创新”之发展而形成者,如英、美、法是。后一种现代化是一个社会与前者接触后,“借取”前者经验而发展者,德、苏、日以及大部分社会都属此范畴<sup>①</sup>。再说得明白一点,自我本土发展之现代化,是经由社会内部的创新而形成的,它可以由点点滴滴的累积或某种科技的突破而促成的,欧西的社会一般属于此一现代化的型模。经与现代社会接触而思效法、借取之现代化,则是受到外力的刺激与挑战,而自愿或不得不见“贤”思齐,或“迎头赶上”者,非西方社会大都属于此一现代化型模<sup>②</sup>。在这里,我们应特别注意的是第二种现代化,即受外力的刺激与挑战而从事工业发展及社会、政治变革的一种外发性的现代化,因为这种现代化正是中国现代化的型模。

## 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及其特征

要了解中国之巨变,或中国之现代化,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之特征及其历史背景。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本的一个相当自足的社会系统。生产主要靠人力与兽力。中国非无科学技术,此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之《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

① M. J. Levy,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et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② 参见 F. W. Riggs, *Administ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4)。笔者对 Riggs 之理论已有介绍,见拙著《行政生态学》(台北,商务,人人文库 466 号,1967 年)页 163—167 及 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ary Change* (Boston: Little Brown Co., 1966) pp. 64ff.

应可作为铁证,但中国并无如西方之科学革命<sup>①</sup>,科技亦未能大量用到生产上。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心价值系统,重天人合一,重社会之秩序与人伦之规范。此表现于政治经济上,则尊王(公道)黜霸(权力),重义(公正)轻利(财富),表现于社会之人际关系上,则讲究长幼之序,男女之别。钱宾四先生谓中国文化之特质是“调和协合”<sup>②</sup>,唐君毅先生谓中国文化精神,重“融合贯通于一统”<sup>③</sup>,皆极中肯綮。这套中心价值系统之主要功能,借社会学家柏森思(Parsons)之理论来说,乃在“整合”(integration),亦即强固社会之和协与整一<sup>④</sup>。中国二千多年来政治上虽多治乱兴亡之迹,但整个社会之基本结构并无大变,有变者亦止“在传统之内变”<sup>⑤</sup>。我们可说,古典中国社会,无大变局,亦非全停滞,而是呈现一“移动的平衡”(moving equilibrium)状态(此可说是一种演化的转变)。而这套中心价值系统,赖著一深密繁富的文字传统,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乃能代以继代,绵延不

---

① 照 Thomas S. Kuhn,“科学革命”是指一套理解自然世界的新科学概念之出现,即突破“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之传统概念:它不是累积性的。它是一套新的科学典范(paradigms)。See,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second ed., 1970.) pp. 1—9。

② 钱穆,《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页23—33。

③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53年,页15。

④ 柏森思以为任何一个社会系统如要存在、发展,皆必须有四种基本而必备的功能,一是“适应”(adaptation),指社会系统必须对外界之压力与需求有所适应,此则包括改变外界之状态。二是“目的获求”(goal-attainment),指社会系统在“认定”目的之后,动员内在之资源加以获求。三是“模式维持”(pattern-maintenance),指维持社会系统之文化模式言。四是“整合”(integration),指社会系统须将系统内部之各单元调和统协为一整体之谓。See, T. Parsons, et. al., *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3.) pp. 183—186。

⑤ 参 E. A. Kracke, Jr., “Su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in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1954), pp. 479—89。

绝。中国在此一长期的历史结构里，由于地理上与外界的相对地隔绝，加之在文化上为诸较低度开发之民族所环拱，乃自然而然形成中国为“天下”之“中”之君临意识，以及一种伟大悠远的历史传统感。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几乎是最自然不过之事，亦即很少在意识层中活动者。过去历史上虽有辽、元、清之入主中国，但此仅止在政治层上活动，而在文化社会层中，并未掀起若干波浪，而他们之出现，也只是中国历史传统中之小转折，他们之活动亦被限于中国文化社会之基本格局中。他们最后且被“中国化”了。以此，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这数次异族之入侵，不但无损中国人之历史传统的认同，且反而加强了中国人之历史传统的认同。白鲁恂(Lucian Pye)以中国无“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sup>①</sup>，此若就中国古典结构中说是不错的，但到了现代则并不尽然，此点下面还要说到。在这里，我们应对中国社会之组织性格有一说明。中国社会严格来说不算一个国家，维系古中华帝国之统协性者，是上面提及的儒家的中心价值系统，故 R. Park, B. Russell 等说中国只是一文化国<sup>②</sup>，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二个不同的结构之合，据杨庆堃先生说，一个是全国性的科层制度的上层结构；另一个则是庞大的无数异质性的地方社区<sup>③</sup>。艾深思坦(S. N. Eisenstadt)说古中华帝国一方面有一个独立的“帝国中心”，它常是政治及文化的焦点(亦可说是“大传统”的发育

---

① Lucian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M. I. T. Press, 1968.), Chap 1.

② 见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香港集成图书公司，1970年重版，见第九章。唐君毅先生称中国自汉以后，可谓纯为一“文化国”，见前引《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页49。

③ 参 C. K. Yang, *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 the Family & the Village*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Paperback ed., 1965) Chaps. 1, 12; Franz Schurmann "Chinese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Macmillan, The Free Press, 1968 Vol. 2.) pp. 408—425.

处),另一方面则是许多落在“边陲”的社会单元(常以乡村为形态,此可说是“小传统”的发育处),居二者之间则是儒吏集团(士大夫与乡绅)<sup>①</sup>。中国社会并未像西方社会一样,发展出与“政治中心”对峙的多元中心(真正之儒生并未能依道统而形成一独立而可与政统抗衡的中心)。其结果,诚如 Wittfogel 所说形成一“国家强于社会”的现象<sup>②</sup>。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帝国“中心”对“边陲”的社会并未发生深入的穿透,所以尽管帝国中心对边陲的社会施以各种的控制方法<sup>③</sup>,但帝国的能力顶多达到消极维持统一的地步,而并未能做到可以凝结、动员社会力量以赴政治目标的程度,中国人只有不移的“文化认同”,而鲜有明显的“国家认同”。此所以我们只能说中国传统社会只是——以文化为基底的“天下性”的结构,而不能说是——以政治为基底的“国家性”的结构。这个了解是我们以后捕捉中国现代化运动(特别是政治方面的)精神的主要关键之一。

我个人相信,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现象之一便是过去“中心”与“边陲”非常松弛隔绝的关系(天高皇帝远)已变为“中心”与“边陲”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

中国社会是一具有自足性的社会系统。其各个部分与部分间,部分与全体间的关系非常松弛,因此,部分的动乱崩解不足影响全体。这就构成中国这一全国性社会系统的安定性的原因,当然,这不是说其内部没有紧张、冲突或变革,……于此,我们可说中国社会的统协性整合性极强,它自己不易开出基本的“结构

---

① S. N.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N. Y. : Free Press, paperback ed., 1969) 见 Preface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

② K.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Chap. 3.

③ 参萧公权,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的形变”(structural change)<sup>①</sup>。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代化是要待外力的挑激才开始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巨变外力之挑激是必要、充足且唯一的理由)。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巨变是因十九世纪末叶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轰击而开始的。坚船利炮当然是科学技术的产品,汤恩培曾指出西方之“陌生的技术”较“陌生的宗教”易于为非西方社会所接受,因后者涉及到人群的内在的价值、信仰等,而前者则是价值中性的<sup>②</sup>,此说从人类学的“濡化”的过程看是不错的,但西方出现于中国的“陌生的技术”却不是电冰箱、电视机,而是“坚船利炮”,是则坚船利炮所代表者不是科学技术,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故而西方之“陌生的技术”在当时中国人眼中不是价值中性的,它代表一种邪恶与威胁。故当时大臣中有“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机器为公愤者”(郭嵩焘语)。这一历史事实可以解释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曾国藩、李鸿章到张之洞等之自强运动——即是在一种无限的精神委曲下开始的<sup>③</sup>。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下被逼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受最大的屈辱,过去一百年,即是中国的“屈辱的世纪”。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

---

① 此处所谓“结构的形变”是指“社会型态”的变迁,而非少量的,点点滴滴的变革。参 Ralf 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66. 但中国社会在理论上亦非完全无开出“结构的形变”之可能。盖积小变可以成大变。参 Chalmers Johnson, *op. cit.*, p. 55.

② Arnold Toynbee, *Civilization on Trial: the World & the West* (N. Y. : The World Publishing Co., 1958.) pp. 267ff.

③ 参唐君毅著《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人生,1958年,页168—170。

国百年来之现代化运动，实是一雪耻图强的运动。而此一雪耻图强运动，分析到最后，则是一追求国家“权力”与“财富”的运动<sup>①</sup>。中国社会原来之重和协整一的中心价值，现转为重“财富”与“权力”的追求，此即中国这一社会系统已从“整合”之价值转而为重“目的获求”的价值。但是，雪耻图强只是一种心态，至于如何雪耻图强则涉及到认知的问题上去。亦即涉及到如何“变”及变到何种程度、变成什么等等问题，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的。

### 三、中国现代化运动之主角及“认同”与“变革”二观念之消长

中国现代化一开始即与政治发生最深的关系，因为这是与中华帝国的存亡问题不可分的，所以，很自然地，政治上的领导人物便处于一个战略性的主导地位<sup>②</sup>。当然，这现象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是有关的，前面指出控制中华帝国的是一个具有独占性的“帝国中心”及附缘于帝国中心的儒吏集团。在社会中，并没有其他强有力的权力中心。从中国古典社会的权力结构说，影响、宰制国运的只是宫廷及“在朝”或暂时“在野”的秀异分子(élites)。而这些在朝或在野的秀异分子，由于中国学术与政治之不可分性(特别是通过儒家意理而设计的考试制度)，乃具有政治的与文化的双重性格。这个性格一直到今天还基本未变。只是自民国以后，中国的秀异分子已不能再用“在朝”与“在野”的二分法来分。因为民国以后，传统的帝国中心已经崩解，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级亦已经没落，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较具异质性

---

① Benjamin Schwartz 写严复一书，即以 *In Search of Wealth & Power* (N. Y. : Harper Torchbooks, 1969) 为名。

② 见 T. Parsons, *Structure &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N. Y. : Free Press, 1960. ), p. 124.



的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包括大学教员、大学学生、报章杂志界的新闻从业员，以及科学界、工业界、商业界等的领导层人物。这个异质性知识分子集团虽然还没有在社会生根，或者说，还没有“建构化”，但他们至少在某程度上已从传统的“政治体”(polity)走出，而开始把脚伸向“社会”中求根。他们是学术、文化、工商界的秀异分子，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与掌握政治(或军事)权力的秀异分子几乎扮演著同等分量的角色<sup>①</sup>。故中国现代化自始即是一秀异分子领导的“自上而向下落”的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性与文化性的运动(经济的性格到后期才比较突显，但仍然是臣属于政治之下的)。因此，要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化的动理，我们必须分析这些政治与文化的秀异分子对现代化的认知及他们的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取向。在此，我必须说明，我们这里重视秀异分子对现代化的认知，只是了解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性的观察点，这并不意味我们不能从其他客观的因素，如社会人口之转变、工业化的渗透与扩大、都市化的形成等来谈。事实上，这些客观因素实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动力。而这些因素所造成的中国现代化的动理常非中国的秀异分子的认知能力所及。(从这些因素去了解中国之现代化则我们不妨说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个“由下而向上逼”的运动。一个完整的中国现

---

① 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史中之地位是时贤所共认的，他们与中国现代化之成败有著深切的功过关系。(参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台湾，东海大学，1968年，再版，页233—239)。费孝通先生以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是一没有技术知识的阶级，因而他以为这些知识分子不能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担任领导的责任。此一看法与我们所说并不全同。但亦不冲突(参费著《论知识阶级》，在吴晗、费孝通编《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页13—22)。美国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ils从比较的研究中指出，在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普遍地都扮演著空前重要的角色。See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XI, No. 3 (April, 1960), pp. 329—368.